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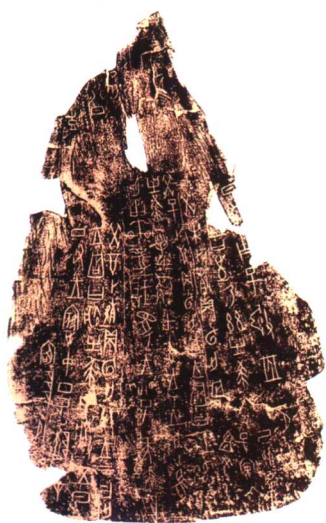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文化精神

李庚香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(下)





中原文化精神

李庚香 著 (下)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李庚香，男，1966年出生，河南省淮阳县人。中共党员，文学硕士，法学博士。2003年参加河南公选，任河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。曾先后在河南省委宣传部、吉林省委办公厅工作，著述有《法美学》、《文化强省与中原崛起》、《文化产业学》、《灿烂的美学》、《当代的精神处境》等。

策 划：单占生 许华伟
责任编辑：许华伟 崔晓旭
责任校对：丁 萍
装帧设计：刘运来
封面题字：张 海

目 录

001/序:认真对待文化

徐光春

001/自序:河南走向文化强省的战略思考

——关于中原文化的理论和历史

李庚香

001/第一章 文化地理学刍议

001/第一节 作为地域文化的中原文化

103/第二节 中原大地与文化创意——以文学为例

120/第二章 中原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观

120/第一节 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

137/第二节 解构与建构: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冲突与交流

191/第三节 文化原型:中原文化发展的三种模式

——中原文化的深层结构

209/第四节 思维范式——中原文化的独特运思

229/第五节 中原文化精神的基本特质

278/第三章 中原文化精神流变的历史

278/第一节 中原文化的“大历史”谱系框架

317/第二节 宋陈学派:中原文化的主体构成

347/第三节 中原北方文化——郑卫文化

365/第四节 魏晋文化:中原文化人格独立的标志

371/第五节 宋代文化:峰巅还是深渊

392/第四章 中原文化形态学

392/第一节 中原文学的古典时代

422/第二节 现代中原文学的命运及选择

430/第三节 当代中原文学的人文景观与审美特质

465/第四节 戏曲:河南的“乡土之音”

500/第五节 中原书风的流变及其定型

519/第六节 中原画派与中原画风

549/第七节 中原风与河南的歌舞大省之梦

555/第八节 诗性思维与当代中原学派

586/第五章 建设与“新河南”相适应的新文化精神

586/第一节 文化河南与中原崛起

605/第二节	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奋力实现河南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
618/第三节	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河南区域文化产业发展
633/第四节	中原文化与全球化
658/后	记

第三节 中原北方文化——郑卫文化

春秋战国时代,是一个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。这个时代提出了我们今天仍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。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:“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最好地生活在一块儿,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。这是一个革新的时代。”(《人的历史》)他们的智慧之光,不仅作用于当时,而且永远照耀着中原文化的发展历程。在这一文化巨变中,“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……皆自以为至极,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”(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)。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以宋陈文化、郑卫文化和申吕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有机体,那么,申吕文化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汇的产物,是中原南方文化。而宋陈道家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主干和主体。与上述两种文化相对应,郑卫文化则代表了中原北方文化。和宋陈文化一样,郑卫文化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精神基础,并与宋陈文化一起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基石。

一、郑卫文化及其主要特色

郑卫文化,主要是指郑国和卫国的中原北方文化。卫国,是西周最主要的诸侯国。武王克商后,卫地曾作为“三监”之地。武庚叛乱被平定后,封康叔于卫。春秋初,卫武公重修康叔之政,勤政

爱民,百姓和睦,国家强盛。武公后,庄公娶齐太子得臣之妹庄姜为妻,卫、齐两国联姻修好。但自桓公至戴公 70 多年间,卫国宫廷纷争,内乱连年,又招致外敌入侵,国势江河日下。郑国,原为周宣王弟友的封国。宣王二十二年,始封于郑地(今陕西华阴)。友作为开国之君,称桓公。因治国有方,百姓皆爱之。西周灭亡后,迁都新郑。郑武公建都新郑后,郑国的势力逐渐强大。郑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是晋、楚两大诸侯国争夺霸业的要冲。当时谁能征服和夺取郑地,就可能成为春秋霸主,郑国因此成为晋楚争夺的对象,连年兵燹,遂逐渐削弱。

郑卫文化,以法家思想为主体。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子产、韩非、李悝、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等人,除慎到外,其余皆是河南人,属郑卫文化。李悝把各诸侯国的法律收集起来,编为《法经》一书。商鞅本是卫鞅,因帮助秦孝公变法有功,被封于商,才叫商鞅。他除了奖励耕战,实行郡县制外,还主张严刑峻法。申不害是郑国人,韩昭侯时为相 15 年,重术。慎到重势。韩非子把法、术、势集中起来,主张以法为教。《韩非子》一书,集法家思想之大成,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作。

子产,是法家早期代表人物。春秋中期,郑国一度“敢为天下先”,采取诸多大胆创新的措施,国家经济快速发展,郑国一时兴旺起来。这时候郑国的掌舵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子产。子产最有名的政治措施,就是取消了井田制,承认土地私有,按田亩征收税赋。当时在郑国引发了一场地震,很多贵族反对。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制



度改革。子产的另一个功劳是“著刑书”，在中国最早公布了法律，公开提倡依法治国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法律条文，比古罗马的“十二铜表法”要早一个世纪。

韩非，战国末期的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。他



韩非



纵观天下大势,认为各国都在变法图强,而韩国却虚弱守旧,因此,多次向国王上书,建议实行彻底的变法。在韩国,其“立法术,设度数”的抱负难以实现,就退而著书,在理论上论述革新政治的重要性。其名字和著作传到秦国后,秦王大加赞赏,并为讨要韩非,发动了一场战争。但韩非在秦受到李斯的谗言而死于秦。韩非虽死,但是其理论却被继承下来,秦王运用韩非的法家理论统一了中国,并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韩非的思想,集中到一起,就是提出了以“法”为主、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的法治理论。商鞅的法,申不害的术,慎到的势,都被他融会贯通。所谓法,就是国家的根本制度,是人君之外所有臣民都必须遵守的根本大法。术则是“藏之胸中,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”。而势则是实行法和术的前提。这些思想,是后来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。

春秋战国时代,物质文明在迅速发展,财富、享受、欲望与野心、权势、罪恶同步增长,文明进步与道德沦丧的二律背反,越来越尖锐地刺激着思想家,生发出改变现状的种种主张,如果说儒家是从调节人际关系入手,以“阻止”世风日下,那么道家、尤其是庄子,则是从强调个体的精神价值入手,呼唤人性的复归。儒家力图以血亲人伦来淡化、美化、融化社会关系。墨家假“天志”的名义向统治者呼吁“兼爱”。道家则企图超越时代、返归人的古朴本性。对于这一切,在人欲横流、争战日烈的现实政治面前,都成为不同程度的空想。唯有郑卫文化中的法家,对现实政治

有着独特的深刻理解。冷眼静观的理智态度,冷冰冰的人际利害关系的算度,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,构成法家学说的冷峻特色。如果说儒家以仁为思想核心,以义为价值准绳,以礼为行为规范,以知为认知手段,体现了一种君子式的宽容文雅,道家文化具有鲜明的超逸之风,那么郑卫文化则体现了一种迥异于儒家的冷峻、严谨。

(一)法家分析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是:“民道弊而所重易也,世事变而行道异也。”(《商君书》)儒、墨、道家都把“民道弊”归结为道德伦理沦丧,而法家却把古人的淳朴归结为当时的生活条件。“人民少而财有余,故民不争”,如今“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劳力而供养薄,故民争。”(《韩非子》)从“财有余”、“故民不争”与“货财寡”、“故民争”的对照,法家深入到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物质的需求层次,毫无顾忌地撕去蒙在社会秩序、道德观念、行为规范、人伦情感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,揭示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,认为一切不过由利使然。因此主张“以法治国”,反对“以德治国”。商鞅说:“明王之治天下也,缘法而治。”韩非说:“以法治国,举措而已。”法家的以法治国,也称“法治”,是与儒家的“人治”、“德治”相对而言的。儒家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人,即所谓“其人存则其政举,其人亡则其政息”,但法家认为,国家必须由掌握实权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。应当承认,相对于儒家温情脉脉的“人治”、“德治”,法家以暴力为基础的“法治”多了几分严酷,但却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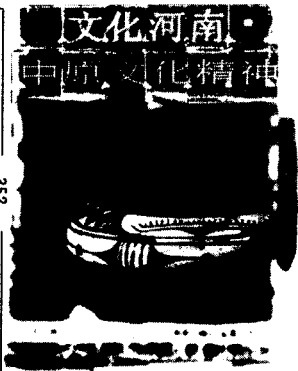
(二)历史进化观。在这个问题上,儒、道、墨家不约而同地效法先王,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古老。儒家崇尚文王、周公;墨家为了胜过儒家,抬出据说比文王、周公还早一千多年的大禹;道家则干脆借助伏羲、神农的权威来压倒儒、墨。与这三家相反,法家信奉的是一种进化发展的历史观。法家先驱商鞅说:“圣人不法古,不修今,法古则后于时,修今则塞于世。”(《商君

书》)韩非嘲笑那种泥古不化者是守株待兔的蠢人。法家认为,“上古竞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谋,当今争于气力”(《韩非子》)。既然古今情势异同,法家强调“因时变法”的重要性。商鞅主张“当时而立法,因事而制礼”(《商君书》)。韩非认为“古今异俗,新故异备,如欲以宽缓之政,治急事之民,犹无辔策而御悍马”,因此,“世异则事异,事异则备变”,“是以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,论世之事,因为之备”。落实到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,“法与时转则治,治与世宜则有功”。

与之相应,郑卫文化具有勇于变革的精神。在韩非看来,当今之世,民性巧诈,上古之世的制度就不再适合,因此必须进行变革,根据今天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新的制度,并把“富国强兵”作为法治的目的。

(三)严于吏治。经过法家在各诸侯国的变法,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,官吏的选任制取代了旧的“世卿制”,建立起了以国君为首的封建官僚政府。由于前期法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新旧两种势力和制度的斗争,不可能把吏治作为关注的焦点,但到了后期,如何处理好新制度下君主和臣下的关系,就成为其首要任务。

韩非依据“当今争于气力”,“力多则人朝,力寡则朝于人”,推出“仁义用于古而不用於今”的结论。他以“严家无悍虏,而慈母有败子”为喻,证明“威势之可以禁暴,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”。他把仁义、兼爱都扔在一边,只推崇严刑峻法,“夫圣人之治国,不恃人之为善也,而用其不得为非也”。



(四)注重经济。法家十分重视经济基础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,主张把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。

郑卫文化在艺术上的代表是“郑卫新声”。春秋后期,由于新兴的封建势力逐步发展壮大,诸侯追求声色,根本不再遵循旧有礼乐,这样民间歌舞得以兴盛。而所谓“雅乐”,即先王之乐已失去了其审美感染力。据《诗经》记载,“陈风之乐”和“郑卫之音”在中原大地非常兴盛。《宛丘》描述的是“陈风之乐”：“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，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。”不过，郑卫之音在当时春秋列国中，艺术感染力最强，魏文侯曾对子夏谈过他的感受，“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卫之音，则不知倦”。子夏指出“郑音好滥淫志，宋音燕女弱志，卫音趋数烦志，齐音敖辟乔志。此四者皆淫于声而害于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”，并告诫魏文侯“为人君者，谨其所好恶而已矣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。同“先王之乐”相比，陈风之乐和郑卫之音，虽然做不到“哀而不淫，乐而不伤”，但更能展示生命个体的要求和欲望。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，极为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征。孟子“见于王曰：王尝语庄子以好乐，有诸？”王变色曰：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，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当然，陈风之乐和郑卫之音也有所不同，如果说陈风之乐较多地体现了男女青年健康的情趣，那么郑卫之音由于多是些桑间濮上之音，则多了些淫荡。《诗经·宛丘》描述的陈风之乐是“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，无冬无夏，值其鹭羽”，是青年男女欢乐的相爱场面。郑卫之音则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载：“中山地薄人众，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，民俗褻急，仰机利而食。丈无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……为倡优，女子则鼓鸣瑟……游媚贵富，入后宫，遍诸侯。……郑卫俗与赵相类。”又说：“赵女郑姬，设形容……不择老少者，奔富厚也。”郑卫文化和前商文化有继承关系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：“帝纣，好酒淫乐……使师涓作淫声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。……大聚乐戏于沙丘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男女裸，相逐其间，为长夜饮。”于是，《周本纪》记载：“武王乃作太誓，告于众庶：今殷王纣……断弃其先祖之乐，乃为淫声，用变乱正声，悦

说妇人。”在这个意义上，人们又称“郑卫之音”为“淫声”、“亡国之音”。同时，由于郑卫之音随性吟唱，不像礼乐有特定的表演场所，即所谓“嘉乐不野合”，孔子对此十分反感。倒是孟子较为开通，他审时度势后指出“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几乎？今之乐，由古之乐也……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”，从而赋予了“郑卫新声”一个合理的存在根据。

二、前工业化进程与郑卫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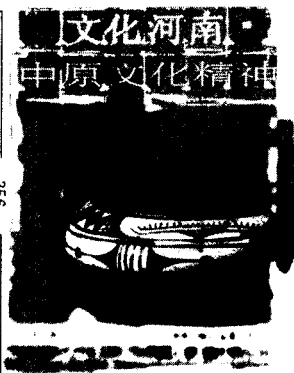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而言，周部落随着平王东迁而解体，但是直到春秋后期曾与周胞族有血缘关系的氏族，仍顾到他们昔日的联盟关系。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载：周邦告饥于鲁，“公为之请籴于宋、卫、齐、郑”。但公元前 517 年，宋使在会盟中拒绝晋要求与会国救周的提议：“我不输粟。我于周为客，若之何使客？”

郑邦是周宣王时从周胞族中分化出来的氏族组织。在郑国，公元前 526 年，子产追述说：“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。”公元前 770 年，周平王率宗周遗民在洛邑建国，相继任郑武公及其子郑庄公为执政官，但后来又有任虢公为周两执政官之一的打算，为郑庄公所反对。后周桓王任用虢公为执政官，并率陈、蔡、卫联军伐郑，为郑庄公所败，从此“周郑交恶”。郑邦原是周宣王时从周胞族中分化出来的氏族组织，当时它虽然是个小

文化河南·
中原文化精神



邦,但由于地处四方贸易之中,而国势渐强,特别是春秋时期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致使商人崭露头角,郑卫文化迅速发展。公元前565年,郑司马子国打胜了蔡,郑人都在庆祝,子国的儿子却说:“小国没有把内政弄好,却先立了战功,那是祸种。楚人来讨伐怎么办?依了楚,晋人来讨伐怎么办?从今以后,至少有四五年郑国不得安宁了!”这个小预言家就是子产。执政贵族与商人们世有盟誓,“尔无我叛,我无强贾”(《左传》)。为此子产曾断然拒绝了晋国胁迫郑执政者强买商人玉器的要求,重申不背弃与商人的盟约。后郑的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诈为郑使以犒秦师,《诗·卫风》中“氓之蚩蚩,抱布贸丝”等,都反映出郑卫之地的城市化、工业化进程大大高于南方宋陈文化。春秋前期,郑庄公在中国城邦的图霸斗争中,曾一度崭露头角,但郑庄公死后郑即陷入了诸子争立的内乱之中。随着齐、晋、秦、楚的崛起,郑国四面受敌,时常因兵临城下,而不得不朝与晋盟而昔与楚盟,向大国献贡,在夹缝中求生存,失去了发展的机会。春秋中期,郑国在这七八十年间,受战祸七十多次,宋国四十多次。郑、宋在晋、楚的攻势下,既要从楚,又要从晋,“牺牲玉帛,待于二境”。后子产改制,其主要特色是:(一)实行内部民主制度。他保留了国民在乡校中评议执政得失善否的民主制度,以否定“作威以防怨”的专制政体。(二)意图建立法制政体。公元前537年,子产著刑书。子产在“作丘赋”以前,郑国民众颂声大作。而后郑国民众又诅咒起他来,子产说:“民不可逞,度不可改。”(三)为政体现“择能而使之”的原则。子产“苟有利于国家,生死不改”的誓词,他的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的理论,后来在林则徐身上再次应验,体现出中原文化的风骨。有人问他从政的道理,他说:“政治好比庄稼的功夫,日夜要筹度;起先筹度好就做到底,从早到晚若干,可别干出了筹度的范围,好像耕田不要过界,那就很少有错失了。”他死时,嘱咐继任的人道:唯独非常有德的人才能靠宽纵服人,其次莫如用猛力。子产的死耗传到鲁国,孔子含泪叹道:“古之遗爱也!”他和子产却未曾会过一面。



卫国，是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，建都朝歌，主要统治商的遗民。卫国本在河北，春秋前期，狄人攻邢灭卫。齐桓公将邢人迁到夷仪，将卫人迁到楚丘，并以同盟名义为其筑起了新城，致使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”。

无疑，郑卫文化具有不同于宋陈文化的特色。商族为东夷的一支。商以游牧业为主，商业贸易发达。据说，王亥曾赶着牛群到易水流域交易，被有易氏的首长杀死，牛群也被夺去。他的儿子上甲微即位，打败了有易氏，夺回了牛群。宋国，原是商之后裔。是纣王之兄微子启的封国，建都商丘。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消灭了商的军事主力后，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都，利用其统治商的部分遗民。宋是接替齐国霸业的小国，它希望在楚的支持下称霸中原。但楚成王执宋襄公以伐宋，与郑结盟。宋楚交战，当宋军严阵以待时，楚军渡河未尽，既渡未成阵列时，宋国大司马一再建议宋军宜趁机发起攻势，却被宋襄公拒绝。在楚军布列成阵后，宋襄公才下令进击楚军。宋军大败，襄公受伤，不久死去。公元前 286 年，宋国为齐所灭。《韩非子》中对于“守株待兔”的批判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郑卫文化对宋陈文化的优势。一般而言，宋商文化具有以下特色：1. 僵化的守信。2. 消费性。商之后期，贵族生活极为奢侈腐朽。一如《尚书》所载：“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闻小人之劳，惟耽乐是从。”商朝末年，纣王即位，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，而盈钜桥之粟。又作“酒池肉林”，“为长夜之饮”。大小贵族无不沉湎于酒色。3. 女权。4. 敬祖。而郑卫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和宋陈文化相